



普希金诗集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俄罗斯〕亚历山大·普希金著
刘文飞译

普希金诗集



〔俄罗斯〕亚历山大·普希金著
刘文飞译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亚历山大·普希金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他在其并不太长的创作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文论、史著等大量文学遗产，而在这一切之中，最为后人所喜爱、所传颂的，首先又是他的抒情诗作。我们从其中挑选出二百余首我们认为是最好的诗作来，组成了这本集子。

尽管普希金的抒情诗创作是富有变化的，不同时期的抒情诗作呈现出了某些不同的风格特征，但是，在他的抒情诗中，仍不难看出某些一致的诗歌主题。普希金的诗歌题材丰富多彩，个人情感和社会生活，爱情和友谊，城市和乡村，文学和政治，祖国的历史和异乡的风情，民间传说和自然景致，等等，在他的抒情诗歌中都得到了反映。而且，所有这些题材，都像一缕缕平行的红线一样自始至终贯穿在普希金的抒情诗创作中。

普希金首先是个生活的歌手，对爱情、友谊和生活欢乐（及忧愁）的歌咏，构成了其诗歌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在其最初的诗作中，普希金就模仿巴丘什科夫等写起了“轻诗歌”，后来，尽管忧伤的、孤独的、冷静的、沉思的、史诗的等诗歌基因先后渗透进了普希金的抒情诗，但对

于生活本身的体验和感受，却一直是普希金诗歌灵感的首要来源。在普希金关于生活的抒情诗中，最突出的主题又是爱情和友谊。

收入此集的普希金最早的抒情诗《致纳塔丽娅》就是一首爱情诗，此后，普希金一生便从未停止过爱情诗的写作，他一生写作的爱情诗有二百余首，约占其抒情诗总数的四分之一。普希金生性多情，爱过许多的女性，也曾为许多的女性所爱，在他的抒情诗中曾闪现出身影的女性就有十余位，如皇村的女演员纳塔丽娅、“年轻的寡妇”玛丽娅·施米特、普希金“早年的爱”索菲娅·苏什科娃、将军的女儿拉耶夫斯卡娅、彼得堡的美人奥尔加·马松、普希金向其求婚未果的玛丽娅·普希金娜、沙龙的“女祭司”叶夫多基娅·戈利岑娜、“和拜伦接过吻的”希腊姑娘波里赫罗尼、意大利女子玛丽娅·里兹尼奇，等等。然而，在普希金的情诗中留下较深痕迹的，则是巴枯宁娜、沃隆佐娃、克恩和冈察洛娃这几位。巴枯宁娜是普希金一位同学的姐姐，还是皇村学校学生的普希金，深深地爱上了她，为她写下了一系列的爱情诗，如《歌手》、《给她》、《给巴枯宁娜》、《爱人的话语》、《愿望》等十余首，这些诗中所流露的，主要是一种爱的朦胧和愁苦，近似哀歌（其中就有两首以《哀歌》为题，这组献给巴枯宁娜的诗后来也被人称为“1816年哀歌”）。在《愿望》一诗中，年少的诗人写道：“我在流泪；泪水给我以安慰； / 我在沉默；我的低语没出声， / 我的心灵充满了忧伤， / 其中也有痛苦的幸福。 / 哦生活的梦！飞吧，我不惋惜， / 虚幻的梦境，请在黑暗中消失； / 我珍重我那爱情的痛苦， / 就是死，我也要爱着去死！”面对爱和爱的忧伤，诗人是痛苦却又坚定的。这场爱也许是

没有结果的，但它却使普希金的爱情诗创作步入了成熟。在南方流放时期，普希金爱上了奥德萨总督沃隆佐夫的妻子，对她的爱，自然会给普希金带来麻烦，甚至灾难，这也是后来导致普希金被押往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是，这段爱情却给普希金的读者留下了所谓的“沃隆佐娃组诗”，其中包括《“就算我已赢得美人的爱情……”》、《被焚的书信》、《“保佑我吧，我的护身符……”》、《“一切都献给了你的记忆……”》等。仅从诗中来看，与沃隆佐娃的恋情也许是普希金最痴情的爱，在《致大海》中，普希金提到了这场爱。若干年后，在结婚前夕，普希金仍没忘向这位往日的情人作深情的“道别”：“遥远的女友，请接受 / 我这发自心灵的道别， / 像一位丧夫的妻子， / 像朋友，在友人被囚前， / 默默地拥抱他的双肩。”（《道别》，1830）有幸获得普希金成组情诗的另一位女性，是彼得堡图书馆馆长、艺术科学院院长奥列宁的女儿奥列宁娜，普希金在1828年连续地为她写了《你和您》、《“枉然的赐予，偶然的赐予……”》、《“美人儿，你别当着我的面……”》、《“幸运者，是被你任性地用……”》、《“奢华的城，可怜的城……”》等诗，称她为“拉斐尔的天使”，向她倾诉道：“讨厌的都市之所以还让人留恋，仅仅是因为你生活在其中。”在普希金的爱情诗中，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样几首：《致克恩》（1825），《圣母像》（1830）和《“我曾经爱过您：这爱情也许……”》（1829）。在我国，《致克恩》无疑是最广为人知的普希金诗作之一：“我记得那神奇的瞬间： /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 / 就像昙花一现的幻象， / 就像纯洁之美的精灵。”克恩和她的美丽就这样凝固在普希金的诗中了，就这样赢得了不朽，这便是诗的力量！普希金的情诗虽多，但

写给妻子冈察洛娃的却很少，因此，普希金在其中将她称为“我的圣母”的《圣母像》一诗就显得很醒目了。《“我曾经爱过您：这爱情也许……”》一诗是普希金的“晚期”爱情诗，普希金的爱情仿佛也像他的诗艺一样成熟了，诗人在诗中写道：“我曾经爱过您：这爱情也许 / 还没有完全在我的心中止熄； / 但是别让这爱情再把您惊扰； / 我不愿有什么再让您忧郁。 / 我曾经默默地无望地爱过您， / 时而苦于胆怯，时而苦于嫉妒； / 我曾爱您那样真诚那样温存， / 上帝保佑别人也能这样地爱您。”这样的爱，是无私的、温情的，同时也无疑是崇高的。

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与爱情占据着同样地位的是友谊的主题，诗人以《致××》为题的诗有百余首，受到普希金直接题赠的友人达四十余位。在普希金的这些友人中，既有著名的诗人如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巴拉丁斯基、雅济科夫等，有他皇村学校时的同学如普辛、杰里维格、戈尔恰科夫、丘赫里别凯尔等，也有著名的思想家如恰达耶夫、著名的英雄如达维多夫，既有普通的军官，也有同事或旅伴。其中，获得普希金赠诗最多的，是达维多夫、恰达耶夫、杰里维格、茹科夫斯基、普辛、戈尔恰科夫、维亚泽姆斯基、巴拉丁斯基和雅济科夫等人。在这些诗歌中，普希金歌颂友谊，同时也谈论诗歌和生活，现实和幻想。在这些“友谊”诗中，普希金的“皇村主题”是最为赤诚的，除了他的两首《皇村的回忆》、他写给皇村学校同学的献诗外，普希金还几乎每年都要在皇村学校建校纪念日（10月19日）这一天写一首诗。从这组“校庆诗”中，可以看出普希金情感上的变化，从少年时热烈的欢庆、对酒神的盛邀，到中年时面对越来越“稀疏”的聚会而有的

感慨和哀伤。但是，其中不变的却是对母校的那份眷念，对同学的那份深情。诗人通常是孤独的，可普希金却有着如此之多可以通过诗来进行交谈的朋友，这不能不说这是普希金的幸运，这也许会令每一个现代诗人感到嫉妒。

将普希金的爱情诗和友情诗作一个比较，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差异。首先，普希金的爱情诗几乎都是主题单一的，都是对情人的爱慕，关于爱的欢乐或忧伤的倾吐，可他的友情诗的主题却几乎都是复合型的，除了对友情的赞美、对往日的缅怀和对友人的祝愿外，其中大多要谈到诗歌和文学、社会和人生。比如，他的三首《致恰达耶夫》(1818, 1821, 1824)就不仅仅是写给朋友的友情诗作，而且是面向同时代人的正义呼唤，是典型的公民诗歌和政治诗歌。其次，普希金的爱情诗大多短小精悍，很少超出三十行，而友情诗则大多洋洋洒洒，一泻而下，例如，《致尤金》一诗就长达二百余行。似乎，面对爱，普希金永远在小心翼翼地挑选最恰当、最精细的字眼，而面对友谊，他则可以毫无顾忌地高谈阔论，将心底的一切索性地一吐为快。最后，他的友情诗多为直接、自然的诉说，很少结构或意境上的营造，而他的爱情诗却结构精巧，并常常利用某个细节或场景强化地、“曲折”地吐露心中的柔情。比如，心爱的人一次“你”和“您”的误称，情人送的一个护身符，一道躲避的目光，脸上的一丝羞怯，都会被敏锐的诗人作为细节用在自己的诗中。他曾写道，他愿意是美人沐浴的河中的波浪，是闻鼻烟的姑娘身上散落的烟丝……普希金的爱情诗和友情诗的这些差异，也许是由于题材自身所决定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普希金对待爱情和友情、女伴和男友的不同态度。

普希金也是一位公民诗人。他是爱情和友情不渝的歌手，但他绝不仅仅沉湎在情感的象牙塔中，历史和现实的事件在他的抒情诗中都有所反映，大至拿破仑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希腊民族起义和俄土战争、波兰起义和西班牙革命，小至彼得的宴会、沙皇的凯旋、都市的沙龙和画展，都被普希金写进了他的抒情诗。如果仅有那些杰出的爱情诗和友情诗而没有这些现实题材的抒情诗，普希金也许就不成为普希金了，而只能是一位巴丘什科夫式的优秀抒情诗人。作为抒情诗人的普希金之伟大，正在于他空前地扩大了抒情诗的容量，他让抒情诗渗透进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使抒情诗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个人情感之抒发的抒情诗因而具有了社会意义。这一点，是称普希金为公民诗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普希金抒情诗歌的公民性，又首先在于其进步的思想和战斗的精神。1812年的卫国战争之后，俄国沙皇却在国内实行着专制统治，正如当时的一位俄国思想家所言的那样：我们给欧洲送去了自由，却为自己留下了镣铐。俄国的进步力量因此而感到不满，开始了旨在向西欧看齐的自由民主运动，由贵族精英们组成的十二月党人集团开始了积极的反政府活动。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一个诗人若对现实持冷漠的态度，不仅难以赢得社会的拥戴，而且甚至可能是有悖于自己的良心的。可贵的是，普希金是忠于其理想和良心的，在当时的俄国作家和诗人中，除了“职业的”革命家外，普希金是呐喊最多的人之一。从其“第一首公民抒情诗”《致李锡尼》，到他1836年的《尘世的权力》、《“我为自己建起非人工的纪念碑……”》等诗，反对专制、歌颂自

由的主题一直在有力地鸣响着。这类诗作自然会给他带来不幸，使他一生都处在当局的监视和迫害之中，但正是这类诗作，使普希金成了真正的公民诗人。在一个不公正不自由的社会里，崇尚个性自由的诗人往往也会成为社会自由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这也正是他的使命和义务。

诗歌创作的主题，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缪斯、灵感等“诗”的主题，会为任何一位诗人所诉诸，普希金也不例外。除了那些论及诗歌和创作的致友人诗外，普希金还写了一系列直接以此为题的抒情诗作，如《致诗友》(1814)、《缪斯》(1821)、《书商和诗人的交谈》(1824)、《诗人》(1827)、《诗人与民众》(1828)、《致诗人》(1830)等。将这些诗作和普希金在其他诗作中有关诗和诗人的论述结合起来看，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点来。一，诗人是一个严肃的职业。普希金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就题为《致诗友》，这首诗是对同学丘赫里别凯尔的讽刺，也是对做作的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否定，与此同时，普希金也早早地意识到了做为一名诗人的不安和痛苦：“我也不得不出这样的回答；／我一点也不想为自己辩护；／对诗句无兴趣的人是幸福的，／他能安度一生，没有忧虑和痛苦……”二，诗人应该拥有创作自由。普希金对创作自由的呼吁和追求，通常是与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某些诗作中，他也对诗人的自由作了更坚决的捍卫，在《致书刊检查官》(1822)和《再致书刊检查官》(1824)等诗中，普希金对“像个讨厌的太监在缪斯们中间游荡”的书刊检查官以及检查制度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强烈的抨击。三，诗人是先知，是富有使命感的。在《诗人》一诗中，普希金写道：

当阿波罗没有要求诗人做出牺牲时，他也许比谁都渺小；但当他被赋予使命之后，他便会永远高昂着骄傲的头颅。四，诗人与民众的对立。这一点在《诗人与民众》一诗中有鲜明的体现。长期以来，这一“对立”一直是普希金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热点，这一问题也的确是把握普希金诗歌和人生态度的重要依据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民众”的界定。20世纪前的普希金学者，多将“民众”等同于“人民”，从而突出了普希金孤傲、超脱的人格精神；20世纪苏联的普希金学，为了确立普希金人民诗人的身份，便往往将“民众”理解为普希金周围那些敌视诗人的贵族和俗人。这个问题在这里很难展开来说，但有一点应该是无疑的：普希金所言的“民众”自然不是全体俄罗斯人民，他在其他许多场合不止一次地使用过“人民”一词，并将其作为其诗歌最崇高的对象（如《“我为自己建起非人工的纪念碑……”》）；另一方面，普希金的“民众”所指的也不应该是少数与诗人为敌的人，它指的应该是一种多数，是普希金以另一种方式所言的“群氓”，他们的存在为诗人提供了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在普希金的“诗人与民众”的对立中，既有着对周围庸俗生活环境的蔑视，也有着先知式的不被理解的孤独，更有着因普通人理想的淡漠而有的痛心。

此外，在普希金抒情诗歌中较常出现的还有自然的和乡村的主题，源自民间文学的素材和对异域诗歌的仿作等；普希金的短诗中还包括有大量的讽刺诗和所谓的“自由译作”，即普希金根据外国诗人的诗歌主题或意境所进行的再创作。

普希金抒情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并不仅仅在于其广泛的题材和丰富的内容。在诸文学体裁中，抒情诗

的形式意义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因此，有必要在此对普希金抒情诗歌的风格特征作一个简单的归纳。

总体地看待普希金的抒情诗，我们认为，其特色主要就在于情绪的热烈和真诚、语言的丰富和简洁，以及形象的准确和新颖。

抒情诗的基础是情，且是真诚的情。诗歌中的普希金，和生活中的普希金一样，始终以一种真诚的态度面对读者和世界。无论是对情人和友人倾诉衷肠，是对历史和现实做出评说，还是对社会上和文学界的敌人进行抨击，普希金都不曾有过丝毫的遮掩和做作。在这一点上，普希金血液中涌动着的非洲人的激情、世袭贵族的荣誉感也许在起着作用，而面对诗歌的使命感和神圣感无疑是更直接的原因。在《论民众戏剧和戏剧〈玛尔法女市政长官〉》一文中，普希金在做出“假定的环境中的感情的真实、感受的逼真——这就是我们的智慧所要求于戏剧作家的东西”这一结论之前，曾提到：“在颂诗和哀歌中，诗人是描写自己真实环境中的真实感情。”在对“真实感情”的处理上，普希金有两点是尤为突出的。第一，是对“隐秘”之情的大胆吐露。对某个少女一见钟情的爱慕，对自己不安分的“放荡”愿望的表达，普希金都敢于直接写在诗中，以至于后来的普希金文集的编者往往要从维护诗人“声誉”的角度出发对普希金的诗文进行删节，以至于在今天，某位“普希金学家”竟能将普希金这样的“大胆”文字“精选”出来在美国出版一本题为《隐秘的普希金》的书。其实，用心良苦的删节和猎奇性的精选都是不必要的，我们若像普希金一样坦然地面对普希金的真实感情及其结晶，便能更深地体会到普希金及其抒情诗歌的热烈和真诚。第二，是对忧

伤之情的处理。普希金赢得了许多爱的幸福，但他也许品尝到了更多爱的愁苦，爱和爱的忧伤似乎永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普希金一生都境遇不顺，流放中的孤独，对故去的同学和流放中的朋友的思念，对不幸命运和灾难的预感，时时穿插进他的诗作。但是，令我们吃惊的是，普希金感受到了这些忧伤，写出了这些忧伤，但这些体现在诗中的忧伤却焕发出一种明朗的色调，使人觉得它不再是阴暗和沉重的了。正如普希金在《致我的阿利斯塔克》一诗中所写的那样：“我那些隐秘的诗句，／不会使任何人忧伤……”诗人自己仿佛就是一个过滤网，就是一个转换器，使忧伤纯净了，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和美学价值的诗歌因素。普希金自己在一首诗中说得好：“就让命运女神不为我／编织那金色的幸福时光；／幻想中自有人间所有的欢乐！／诗人比命运更高更强。”（《致尤金》）

普希金抒情诗歌在语言上的成就，在其同时代的诗人中间是最为突出的。一方面，普希金的诗歌语言包容进了浪漫的美文和现实的活词、传统的诗歌字眼和日常的生活口语、都市贵族们的惯用语和乡野民间流传的词汇、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和时髦的外来词等，表现出了极大的丰富性，通过抒情诗这一最有序、有机的词语组合形式，对俄罗斯的民族语言进行了一次梳理和加工，使其表现力和生命力都有了空前的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不仅被视为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而且也被视为现代俄罗斯语言的奠基者。普希金诗歌语言的丰富，还体现在其丰富的表现力和其自身多彩的存在状态上。严谨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读了普希金的第一部诗集后，就情不自禁地也用诗一样的语言对普希金的诗

歌语言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怎样的诗啊！……俄罗斯语言一切丰富的声响、所有的力量都在其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体现。……它温柔、甜蜜、柔软，像波浪的絮语；它柔韧又密实，像树脂；它明亮，像闪电；它清澈、纯净，像水晶；它芳香，像春天；它坚定、有力，像勇士手中利剑的挥击。在那里，有迷人的、难以形容的美和优雅；在那里，有夺目的华丽和温和的湿润；在那里，有着最丰富的旋律，最丰富的语言和韵律的和谐；在那里，有着所有的温情，有着创作幻想和诗歌表达全部的陶醉。”另一方面，普希金的诗歌语言又体现出了一种简洁的风格。人们常用来总结普希金创作风格的“简朴和明晰”，在其抒情诗歌的创作上有着更为突出的体现，在这里，它首先表现为诗语的简洁。普希金的爱情诗、山水诗和讽刺诗大多篇幅不长，紧凑的结构结合精练的诗语，显得十分精致；普希金的政治诗和友情诗虽然往往篇幅较长，但具体到每一行和每个字来看，则是没有空洞之感的。这里牵涉一个词和意义、诗语和思想的关系。有人认为，自从西梅翁·波洛茨基确立了俄语诗歌的音节诗体（17世纪后半期）、罗蒙诺索夫创建了俄语诗歌的音强音节诗体（18世纪初）后，俄语诗歌在形式规范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在普希金之前，形式和内容、语言和思想的和谐统一似没有最终实现，一直存在着某种“音节过剩”、“词大于思想”的现象。直到普希金，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在普希金这里，没有“多余”的词和“音节”，他善于在相当有限的词语空间里尽可能多地表达感情和思想，体现了高超的艺术的简洁。果戈理在总结普希金的这一诗语特征时写道：“这里没有滔滔不绝的能言善辩，这里有的是诗歌；没有任何外在的华丽，一切都

很朴素，一切都很恰当，一切都充满着内在的、不是突然展现的华丽；一切都很简洁，纯粹的诗歌永远是这样的。词汇不多，可它们却准确得可以显明一切。每个词里都有一个空间的深渊；每个词都像诗人一样，是难以完整地拥抱的。”别林斯基和果戈理这两位普希金的同时代人，这两位最早对普希金的创作做出恰当评价的人，分别对普希金诗歌语言的两个侧面做出了准确的概括。

纵观普希金所有的抒情诗，可见其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无论是隐在还是突出，都是一致的、鲜明的，这就是：一个富有激情和幻想的歌手，一个充满正义感和自由精神的先知。这一抒情主人公形象的贯穿，保持了普希金所有诗作在情绪上的统一，使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抒情诗歌中的普希金，还是一位出色的风景画高手，尤其是对俄国乡村和大自然的描绘，更是出神入化。在他的笔下，高加索的群山，克里米亚的大海，皇村的花园，米哈伊洛夫斯科耶的原野，俄罗斯大自然中的清晨和傍晚、春夏秋冬、道路和农舍、树木和山冈，等等一切，都生动地再现在他的诗作中。在普希金的写景中，最突出的就是情与景的交融，主观情绪和客观景致的和谐统一，通过看似平静的写景状物来体现出抒情主人公深层的感受或潜在的情绪。1814年，年少的普希金曾给宫中的一位侍女娜塔莎写了一首情歌，娜塔莎通常在夏天陪主人来到皇村，在秋天里又回到彼得堡去。在《给娜塔莎》一诗的开头，普希金以整段的篇幅来写夏秋的更替，以此来状摹其情绪的起伏：“美丽的夏日谢了，谢了，／明朗的日子正在飞去；／夜晚那阴霾的浓雾，／在昏睡的暗影中弥漫；／葱葱的田地空旷了，／喧闹的小溪变得冰凉；／鬈发的森林白了头；／高高的天穹也显得凄

凉。”组诗《秋天》是普希金后期的抒情诗，诗人在诗中将秋天的景致和秋天的忧伤写得十分优美、纯净，达到了俄语山水诗的最高境界。普希金的这一诗歌传统，后来在丘特切夫、布宁、叶赛宁等人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继承。在《致一位艺术家》(1836)一诗中，普希金曾对雕塑家奥尔洛夫斯基写道：“你给石膏以思想，让大理石顺从你……”普希金自己通过诗歌也能让抽象的概念和僵死的物活动起来。在普希金的诗中，抽象的名词，如友谊、爱情、真理、信仰、理智、忧伤、命运、回忆等等，常被拟人化，直接与动词和状人的形容词搭配，它们或亲自开口说话(如《理智与爱情》、《黄金和宝剑》)，或是诗中贯穿始终的第三人称形象。一些物，如“树”(如《毒树》中的“毒树”等)，都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还有许多生动传神的比喻，它们似一个个亮点，从内部映亮了普希金的诗歌。他用“饥饿”去修饰“波浪”(《高加索》)，用“白发”去修饰“时间”(《拉伊莎在将其镜赠爱神时致爱神》)，他说“沉默”是“欢乐的敌人”(《给姐姐》)，说“啤酒”是“恐惧的安抚者”和“愤怒良心的平息人”(《致杰里维格》，1827)；他写道：“我浅薄的天赋，轻烟般地散去。”(《致杰里维格》，1817)“我枯萎，像被移栽的灌木。”(《西斯拉夫之歌·弗拉克人在威尼斯》)他形容说“脸上会覆上伤疤似的皱纹”(《“从西方的海洋到东方的大门……”》)，“舟上的旗帜在昏睡”(《“在蓝色的天空中……”》)；刚下水的“军舰”“像年轻的天鹅”(《“听，炮声轰鸣！战斗的都城……”》)，“暴风雪”“像一个迟归的路人”(《“多么迅速，在辽阔的原野……”》)。我们再来看看普希金对“亮”和“暗”的处理：“将军”“比黑夜更阴郁”(《将军》)，

而“深夜比监狱还要黑”(《骠骑兵》),“晴朗的天空”“像欢乐一样”(《“谁见过那地方,自然在那里……”》),而“她的眼睛”却“像天空一样明亮”(《“我还记得生活最初时的学校……”》),“青春的良心像晴天一样明朗”(《“我的朋友,我忘了往日岁月的足迹……”》)。诸如此类的妙喻在普希金的抒情诗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它们是构成普希金抒情诗之形象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上述特点外,普希金的抒情诗歌在对话和戏剧的因素向抒情诗的渗透、在散文和诗的结合、在诗歌情绪和诗歌结构的呼应等方面也都极具创新意义,极具超前性质,甚至“现代感”。面对这些写于近两个世纪前、今天却仍保持着极高的阅读价值和审美意义的抒情诗佳作,我们不能不感叹普希金之诗歌天才的伟大和不朽。

目 录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 刘文飞 / 1

致纳塔丽娅 / 1

理智与爱情 / 7

致闻鼻烟的美女 / 9

经历 / 11

给娜塔莎 / 13

致大学生们 / 15

浪漫曲 / 19

我的肖像 / 22

老人 / 24

致李锡尼 / 25

玫瑰 / 29

阿那克里翁的墓 / 30

水与酒 / 33